

國士典型陳布雷（上）

費雲文

陳布雷先生，始終以文章報國，為蔣公所倚重。他在蔣公幕府，司文字之役，平章國事，垂廿年之久。終以愛國傷時，油盡燈枯，于民國卅七年（一九四八年）十一月十三日仰藥殉國。感激輕生，振風俗世。蔣公痛悼之餘，曾以「當代完人」輓之。茲特簡介其平生。



陳布雷先生遺照（民國三十七年攝於南京）

自幼挺異 年輕秀才

陳布雷，浙江慈谿人，名訓恩，字彥及，號畏壘；生于清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年）。

自幼聰慧，六歲讀書，十歲即習作文；十三歲習作詩，成「秋日苦雨」一絕云：

「遊子浮雲夢不成，挑燈
獨坐夜淒清；明朝欲向橫
塘路，大雨瀟瀟久未晴。」

十四歲在三士市董家就外傳，董家子咸、子宜兄弟輕財好賓客，當地有志改革之士，常常在他家集會，陳布雷除了勤讀經書和漢魏唐宋文章，習作四書五經義外；並且就董家豐富的藏書中，多所瀏覽，尤喜披閱「新民叢報」、「新小說」、「警鐘報」、「浙江潮」等新思潮刊物。因此，學識日充，新智開啓。

光緒廿九年（一九〇三年）十月，奉父命入慈谿縣城就童子試；他不願意，但又不敢違抗。

因為草草交卷，成績很差，竟然名列榜尾。家人引為恥辱，他自己也懊喪後悔。從此不再去董家，而在家閉門思過，誓雪前恥。

一月再應府試，却能名列前茅，高居榜首。遂隨父買舟冒雪歸家。中途過父執輩孫以文家，孫勉勵他說：

「你這次所以能躍登榜首，係因縣試失敗所激；凡事不患蹉跌，患不能自奮」。

他感奮之餘，次年再赴寧波應院試，又高中第五名秀才。當時他才十五歲，比黃膺白（鄂）十七歲中秀才還早兩年，非常難得。

隨後，他偕三弟訓懋入慈谿縣中學堂肄業，校中規定每週作文一篇，列最優等者記功二次，優等記功一次。凡學業成績每積一功，獎銀幣二角；縣令親課時，最優可得二圓。他因為作文優異，半年之內，和他三弟一共累積獎金達廿一圓之多。暑假全數孝奉母親。母親一面為他們的優良成績高興，同時也嘉許他們能够克制檢約，不亂花錢。



。影合子公女男與人夫偕生先雷布陳

十七歲，轉入寧波府中學堂肄業，校中新生舊生各卅餘人，形成兩派。

某日，同學會開大會，新生相約以「學生新道德」為題，糾正同學的腐化生活，陳布雷當眾演說，辭色嚴厲；得罪了舊學生，引起一大風潮。結果，他被迫自請退學，風潮始平。

休息半年，由張葆靈的大力推荐，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學校預科，插班二年後，自此，生活為之改變，不再沉迷小說家言；而頗覺讀書之樂，尤喜涉獵文學史地方面的筆記小冊，對他以後的文筆雋永，關係不小。

十九歲那年四月，杭州各校舉行聯合運動會，他在

會場擔任新聞編輯，油印分發，是為他練習新聞事業的開始。

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年），他廿一歲了，春初，赴杭州入學府，經過上海，當時他的堂兄陳訓正（吧懷）創辦「天鐸報」，他寄寓數日，聞見益見恢廓，並且開始歎羨記者生活。

為了「鐵道國有」問題，他曾經有致楊度一書，寄洪佛矢先生教正；洪大為贊許，一面刊載「天鐸報」一面勉勵他課餘之暇，多寫文章投寄報館。牛刀小試，即使他傾向新聞事業，也因此開啓了他的撰述生涯。

如椽巨筆 志在世道

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（辛亥）春，他經過上海，留寓十天，恰巧「天鐸報」的編輯戴季陶結婚請假，請他代理；每天撰短評二則，間亦代撰論說，初為新聞記者，一杯龍井茶，一把熱手巾，喝茶揩臉，不覺文思泉湧，下筆千言。

夏天，他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，遂正式就職「天鐸報」，每日撰短評二則，十日撰社論三篇，署名「布雷」。

他之所以取名「布雷」，還有段風趣的小史。原來他在浙江高等學堂肄業時，面頰豐潤，同學輩給他起個「麵包孩兒」的外號。麵包英文叫（Bread），再用譯音而成為「布雷」。他用此筆名，不但紀念當年一番風雅趣事，且亦含有「布鼓雷門」之義。

是年八月十九日，武昌起義。上海各報，不敢得罪清廷，多稱為「逆軍」。「天鐸報」却傾

向革命，稱爲「革軍」，囑陳布雷多作論說。他乃乘機作「談鄂」長文十篇，連日刊載，聲援革命軍。

他在「天鐸報」任事五個月，酬薄事多（每月僅四十元），祇爲興趣關係，並未計較。然而鋒芒顯露，不自斂抑，漸爲總編輯李懷霜所忌，對他再三杯葛。他知不可再留，於是就辭職回家。

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一年），他開始在寧波「效實中學」任教，課程簡易，頗多閒暇，加以他的興趣，仍在新聞事業；所以常常閱覽英文書報；並且每三天譯稿一篇，寄登上海「申報」，署名「彥」。是年三月，加入同盟會寧波支部爲會員。

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年）六月，他的父親去世了，子女衆多。他有弟五人，最大十四歲，最

小四歲；妹四人，最大廿歲，最小才滿月。於是他遵從他父親的遺命，辭去學校職務，在家料理家務以及宗族鄉黨的公益事項；當時，他才廿五歲。

後二年夏，「效實中學」校長何旋卿辭職，學會同人推舉他接任，辭不允，又不能經常離家。於是祇允担任名義，每週去上課五小時，實際校務，由副校長負責。

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年）他的夫人因生產去世，他悲痛逾恆，將家事及子女托親屬照料；次年離家赴寧波，一面在「效實中學」任教，一面兼任「四明日報」撰述。每天撰短評一二則，隨感錄六七百字。當時即有人欣賞他的文字，認爲「思想筆墨，均爲海內報紙所少見。」

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年），他的堂兄訓正與湯節之發起創辦「商報」於上海，約他爲編輯主任，編輯部同仁尚有潘公展、潘史生等人。

他和二潘夙夜孜孜，以充實內容改良版面爲急務。他每週撰評論五篇，星期日撰短評一篇，文辭言論，爲各方所重視。有一次爲了山東交涉問題，與「中華新報」反覆辯論；該報主筆張季鸞（一章）頗贊許商報文章，但不知何人手筆，輾轉詢問，才知陳布雷與潘公展之名，特爲專誠訪談，訂爲知交。

由於「商報」站在同情與贊助國民黨的立場，社論尤具力量，漸爲中國共產黨人所注意，常轉載其文章於「嚮導周刊」中，加以評註；並且對他與潘公展等多

所拉攏。他和潘公展等始終堅持全民革命的立場，不贊成階級革命；不爲所誘。於是中共黨人轉而攻擊他們爲「小資產階級意識濃厚的分子，言論不够澈底」。

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年）邵力子奉國民黨命自廣州赴上海，宴約報界，說明革命局勢；並攜有蔣中正先生親自簽名的小影贈送陳布雷，轉達蔣先生對他非常仰慕之意。八月，他患傷寒重病，疲頓殊甚。北平交通界聞人葉恭綽特別寄贈醫藥費三百銀元，且道相慕相念之深。某次葉由北平赴上海，向友人表示：「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，寥寥不多得，其議論周延，文字雅俊者，在北惟顏旨微，南惟陳長壘而已」——陳布雷自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年）起，在商報發表的社論，開始署名「長壘」。

當時上海的有識之士，除了披閱新報之外；非翻開「商報」，看看當天「長壘」又做什麼文章不可。許多學者專家欽服陳布雷在「商報」所撰寫的社論，認爲他的言論之流暢與鞭撻入理，真是擲地有金石聲。認爲他是民國以來，在言論上最有特殊成就的名記者，他的成功，不僅在言論，還在他的行動與行爲上。他是位剛健堅強的人，明辨是非不作鄉愿；他志在挽救世道人心，而不在個人的升沉得失。十五年冬，國民革命軍已克復湖北、江西等地，蔣總司令駐節南昌，特地邀請他和潘公展赴南昌一會；從此，他由報人逐漸的步上從政的階梯。

書生從政 澤惠地方



民國三十四年陳布雷先生偕夫人在廬山留影。

他和潘公展于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年）初抵達南昌，先見張靜江，再謁蔣總司令，談到北伐局勢，人心趨向，以及如何收攬黨外人心。又二日，再約談，蔣公堅勸他們參加國民黨，嘗謂：「君等在精神上早為本黨同志，入黨與否，本無關係，然國民救國為人生天職，加入則力量更有發揮之處也。」

當年二月，他以蔣公及陳果夫的介紹，參加中國國民黨，隸中央組織部的直屬區分部，遷入總司令部西花廳居住，與張羣、黃郛為鄰。蔣公每三四日必召見談話，命他代擬文字，對他相當禮重。四月，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約他赴杭州任省政府秘書長，六月，赴京任中央黨部書記長。八月，蔣總司令為促進寧漢團結，繼續北伐，毅然辭職離京。他也於當月十八日辭職離京，返家小住。

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一月，蔣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問他擬就何職？他表示：「願終身從事新聞事業，如不可能，願為公之私人秘書，機關重職，非所勝任」，遂入「時事新報」為總主筆，主持該報社論。

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，他四十歲，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；八月，就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兼省府委員。

他在教育廳長任內，除了改進教育外，却以兼省府委員的立場，做了些有益大眾的事。他對浙江的二五減租條例（即後來的三七五減租條例）用了很多功夫，對一些窒礙難行或偏激的部份，以及對地主與佃農的權益，都經斟酌損益，務

使能得公平，而浙江實行二五減租條例的「前文」，即為他所撰。

此外，他常常應蔣主席的電召，攜帶文房四寶，悄然趕往南京，撰寫文字，然後再悄然返回杭州，那時，蔣主席發表的大文章，多數是他執筆的。於是，有識之士，祇要知道他又趕往南京，就可以預期，蔣主席將要有大文章發表了；一時大家贊許他為「大手筆」。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年）十二月，教育部因為鬧人事派系，而不得不由蔣主席自兼部長，調他前往相助，担任常務次長（次年再任政務次長兼中央宣傳副部長）。在任以處理學潮及調整大學教育盡力較多。曾經（一）整頓勞動大學停辦其附設中學；貫徹勞動大學停止招生的命令。（二）平定清華大學風潮（三）廣行國立院校會計報銷。（四）整頓光華大學。（五）整頓上海政法學院及中法工學院。（六）解散北京俄文政法學院，調整北京大學組織。

至於中等教育，則以重質不重量為主；對地方教育行政，則以整理學產及普及小學教育與義務教育為主。

九一八瀋陽變作，中央宣傳部事務頗見重要，而部長劉蘆隱久不在京，於是陳布雷將教育部之事，把錢昌照次長，而每日到中央黨部辦公，與另一副部長程天放多盡宣傳責任。程負責國外宣傳，他則以宣傳方針的制定與國內宣傳為主。

此一時期，他也常奉蔣主席之命撰擬各種文件，每日工作，常在十二小時以上，而他係一人在京，未帶家眷，獨居中央飯店三等房，僅自加一書桌，他也居之亦怡。

是年十二月十五日，蔣主席為了促進南北團結，共禦外侮，毅然辭去本兼各職，離京返奉化。陳布雷乃決心共進退。但行政院最後一次會議，却發表他仍回教育廳長之任，固辭不得。遂於次年一月，赴浙接任。

浙江省財政，以債務支出過多，收支不敷甚大。民國廿二年（一九三三年）的概算，本難平衡，而中央方在暗中佈置國防，負擔再增；以致預算會議，久不能決，主席魯滌平憂形於色。陳布雷首倡緊縮之議，自願從教廳與教育費開始，主張機關經費打八折、教育事業費打九折；而國防建設，則十足支給。於是，其他廳處紛紛贊同，即因此原則，解決問題。

民國廿三年（一九三四年），蔣委員長在南昌行營，事務蠅集，政務方面有楊永泰相助，軍事為熊式輝；惟文字撰述，迄無得力之人；於是邀他前往相助。陳布雷於四月辭去浙江教育廳長，五月前往南昌，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，不親會務，祇司筆扎，留心文化宣傳與理論研究，備蔣公諮詢。

民國廿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一月，他奉蔣公之命，撰「敵乎友乎」一文，攜往上海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於「外交評論雜誌」，暗示日本，「中國決不可能屈服，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生計」。希望因此為日本徬徨無主的國論，開闢新視野，而痛斥野心軍閥的無知，發表以後，各報競相轉載，日本報紙雜誌，也紛紛轉譯，頗能引起海內外的重視，給予日本少壯派精神上的打擊。